

第二章 留学归国后的峥嵘岁月

同盟会领袖黄兴赠言士官生回国：天生此才必有用，我与子别当谁从？众士官生答之以：“誓把雄心挥一剑，积尸不羨故人多”之句，盖相知深，相期切，而党人自负亦綦重也。

——摘自黄兴送别众士官生回国赠言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黄兴）部长命令：

陆军军官学校开办伊始，头绪纷繁，派代理军学局长郑开文于十六日午前九时，齐集官长学生到校行宣布式，发给委任状并点验学生交代，以昭慎重而专责成。

——摘自 1912 年 1 月 16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部长黄兴手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稿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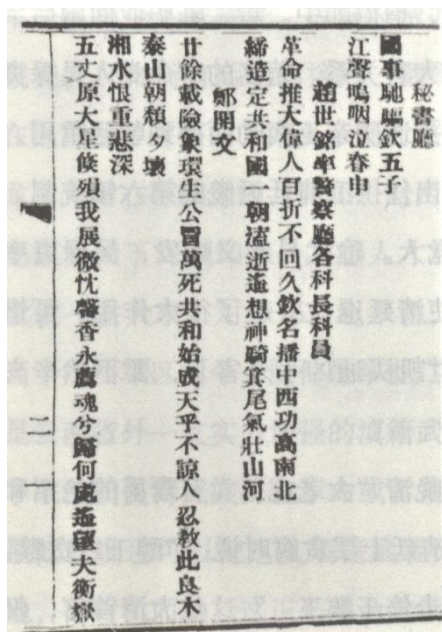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在广西南宁编练新军的活动

郑开文于 1909 年 5 月完成学业回国，并经清政府考核，以考试成绩优等，获授兵科武举人及陆军协军校的头衔。按理说，郑开文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理应回云南工作。这时他已届满 33 岁，一家老小也都盼望着他回滇寻一份职业，撑起家业，给他们带来富足安逸的生活，这是他不能回避的家庭责任、情感之殇。同期毕业的云南同学有 20 多人，尽可在云南组织一支完整的军队，兼有水到渠成，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成就一番事业指日可待。世人皆知云南人是“家乡宝”，地球上所有的风水宝地都比不上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的云南；人世间所有的美味佳肴都没有蒙自过桥米线、建水烧豆腐、通海甜白酒、宣威火腿来得爽快。异乡漂泊的云南人，只要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喝上（云南方言称吃米线为喝，意为爽快）一碗米线，所有的理想抱负、诗情画意都会融化在青山绿水、风轻云淡、四季春暖花开的柔情中。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郑开文毕业回国的第一站是到广西编练新军。当时广西，地僻，民穷，气候热，物产少，生活各方面比云南差很多，并且还不能照顾家庭。如果没有特殊的缘由，老郑同志是不会选择去广西工作这样的憋包事。

导致郑开文到广西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同学都不一定清楚。郑开文、赵伸在 1908 年就与时在日本考察军事的广西右江提督（相当于军分区司令）龙觐光、提督府帮办（副官长）钮永健等人交往密切，龙觐光在日本所有活动的接洽、翻译工作都是由赵伸、郑开文全程陪同。在异国他乡有两位云南乡亲随时陪同，度过一段美好的考察、游玩时光，龙觐光是心存感念的，而郑、赵两人的学问、胆识，待人谦和忠义，也给龙觐光留下深刻印象，甚感人才难得，若能网络至麾下为其所用，定能成就一番大事。对于郑、赵来说，龙觐光与龙济光（时任广西提督，相当于广西军区司令）昆仲是掌握广西军事实权的头面人物，其统率的队伍是云南省外一支实力最强的滇籍武装力量，若以渗透、打入内部的办法，争取他们支持民族民主革命或者策动武装起义，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低程度也可以把这支滇籍武装为我所用，成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基地，待时机而动。这正是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和郑开文等留日士官生所设想的最为捷径的机会。双方有了这样的利益盘算，可能也确实是情投意合，按当时的习惯，遂在日本东京歃血结义，拜

为桃园兄弟。有了龙觐光、龙济光兄弟的这层关系，郑开文尽快实现谋取军事实权的希望就多了些胜算。所以，郑开文到广西工作，有着别人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他不想因为照顾家庭而放弃这个机会。

为了迅速地掌握清政府的军事权柄，利用各种途径打进清政府内部是当时中国同盟会的一个权宜之计，孙中山、黄兴等人深以为然，大力提倡，鼎力相助。黄兴还鼓励富有家财的会员出资捐官，直接打入满清政府的官场、军界，以便更快地掌握兵权，有利于领导和发动武装起义。不少同盟会成员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并当成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策略之一，身体力行。如，光复会成员徐锡麟从日本回国后，花钱捐了一个道台到安徽候补，得任省巡警学堂会办（副校长），混迹于安徽省官场，最终演绎了刺杀巡抚恩铭并壮烈牺牲的一幕，其影响、作用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震撼了清朝廷的统治。鉴于此，家境殷实的党人纷纷效仿，黄恺元花费一万银元，捐了一个道台。陈之骥用银六千两，捐得郎中。黄、陈毕业回国后，很快被清廷召到北京军咨府任职，于此大有关系。著名的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是通过黄恺元从家里筹得两万大洋，买通庆亲王奕劻而得到朝廷重用，短短几年，便擢升副都统（副军长），出任拱卫清廷近畿的第六镇统制，成为在清廷内部谋取职务最高的革命党人。迨武昌起义爆发，吴禄贞率部策动北方各省响应，兵抵京畿，迫使清廷退位，起了很大作用。可惜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关键时刻被袁世凯买通凶手杀害了，要不然辛亥革命也许不是那样的结局。



《郑开文题黄兴挽联》，转载自《蔡黄追悼录》（影印件）

说到奕劻，真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晚清“大老虎”卖官鬻爵的绝招和贪得无厌的嘴脸。史学家刘厚先生细数清廷上层贪腐时说：“醇王之贪黷，远比恭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黷，尤十倍于醇王。”这位大清首富，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的存款，与此可以比较的云南省1916年的全省税收仅为500余万元，可见其贪黷之巨。《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曾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细大不捐，门庭若市”，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据说奕劻收礼很有章法，如果是名目多样的月规、节规、年规、贺喜祝寿等的礼物账单由庆王府回

事处的官员收纳。如果是官员调动升迁、买官行贿则是不收现银的，贿赂者要先把钱送到庆亲王的管事所开设的一个钱庄账号里，换取存款单一纸，装入一个红封套内，带着去见庆亲王。可见，庆亲王对收受贿赂已是泰然处之，官位明码实价，钱财操作有序，实是满清官员贪婪庸恶、卖官鬻爵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前夕，中国同盟会领袖黄兴曾赠诗联与诸同志，寄以殷切希望，其曰：“天生此才必有用，我与子别当谁从？”答之以：“誓把雄心挥一剑，积尸不美故人多”之句，盖相知深，相期切，而党人自负亦綦重也。

笔者发现 1916 年 11 月云南人民追悼黄兴大会上，郑开文有别具一格的悼念挽联呈现，挽联中提到与革命党领袖黄兴的过往和深厚感情：

廿余载险象环生，公冒万死，共和始成。天乎不谅人，忍教此良木泰山朝秃夕坏。

五丈原大星攸殒，我展微忱，馨香永荐。魂兮归何处，遥望夫衡岳湘水恨重悲深。

挽联提到馨香永存的“微忱（枕）”，是什么时候赠与的？郑开文归国后与黄兴仅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有过交集，那时的黄兴可谓日理万机，一个新兴国家的政治建设、军事、外交、经济的千头万绪都需要黄兴协助孙中山先生去完成，估计不可能有送小枕头这样温馨的小事发生。1912 年 2 月 4 日，郑开文等五人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陆军总长黄兴之命到云南组织北伐军和挑选南京临时政府卫戍部队，紧接着郑开文就带领西征滇军参加援藏平叛的战事。推断而来，此事只可能发生在 1909 年春，在日本东京的离别前夕。



郑开文率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全体官佐学生致悼黄兴挽联（云南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查字典，“忱”通“轸”，黄兴原名黄轸，字彦午，送郑开文小枕，是期许勿忘“轸”之谊也。此处“忱”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忱”者枕中书也。古代有枕匣藏宝书的习俗，暗喻黄兴曾有书面指示郑开文回国后进行军事斗争的谋略、计划，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同盟会发给各骨干成员的《革命方略》一书。结合中国同盟会 1908 年前后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的情况来推理，同盟会领袖黄兴赞许郑开文为了革命大业，放弃个人的利益、同学们的希望、家庭的期待，去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完成孙中山、黄兴准备再次在滇桂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构想，亦盖相知深，相期切，而郑开文自负亦綦重也。对于郑开文来说，只要能够迅速掌握军权，积蓄革命力量，完成中国同盟会寄予的希望，什么牺牲都在所不惜。那个时代，支撑所有

人走下去的，都是内心坚定的信念，他们远比现代人认为的经历多得多。流行甚广、影响很大的中国同盟会暗杀团，就是一些为革命事业扫清障碍而英勇献身的壮士们。与这些牺牲的战友相比，生活不适，离乡背井，别妻弃养又算得了什么呢。

1905年后，随着满清政府行宪变法的推进，急切要求广西在短时间内编练新军两协（旅），来应对法国人蚕食广西的攻势。编练新军，无疑需要大量掌握新军事知识的人才，这对处于交通闭塞，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广西来说，各方面的条件显然不具备、不成熟。广西编练新军的机构是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统辖陆军小学堂、干部学堂和学兵营，需要相应的人员承担责任，广泛引进各方面军事人才，遂成为当务之急。满清官员不谙军事，对于编练新军更是外行，故各机构的官长对于用人行政握有相当的实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招揽人才。先期毕业的士官生、同盟会会员王孝缜受广西巡抚张鸣岐的委托，邀约在京候考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国内军官学校毕业生到广西参加编练新军工作。陈之骥、李书城、程子楷、赵恒惕、孔庚、程守箴、袁华选、石陶钧、王孝缜、尹昌衡、郑开文、罗佩金、杨源浚等日本留学归来的士官生，还有国内各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如吕公望、冷御秋、刘建藩、耿毅、何遂、孔庚、钱漠、林之渊、杨明远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先后到达广西的。这些人不但待遇优厚，擢升、重用迅非寻常人员。一般都会当到管带（营长）或军事教官等职务，担任督办、校长、监督、参谋、团长等要职也不在少数，成为广西编练新军的主要力量。

另外，第一任兵备处总办庄蕴宽、帮办纽永建，都是当时社会上知名之士，热衷于社会变革，同情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关于革命党人云集广西的来龙去脉，著名将军陈之骥的回忆录提供了另外一种版本：

……要谈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大批进入广西的问题，必要提一提当时任清廷广西省兵备处总办庄蕴宽其人，才有来龙去脉，脉络贯通。……庄（蕴宽）出任兵备处总办的时候，曾邀请了他的同乡纽永建来广西帮他的忙，开办了广西陆军讲武堂，随后又请纽永建为兵备处帮办。纽永建早就是同盟会员，他为了利用广西建立新军的机会来培养广西革命力量，于一九零八年亲自到日本邀请同盟会员李书城、王孝缜和我一同来广西，参加建立新军的工作，那时我们在士官学校还未毕业，不能回国。一九零九年我们毕业回到北京，清廷要将具有陆军大学程度的毕业生进行考试，授以功名，我们不愿意应考。正在这个时候，纽永健又跑来北京邀请我们去广西，连路费也都带来了。当时对邀约的对象和发布的地区，事先都是有了筹划的，那就是：首先是同盟会的会员或进步分子。其次是，每一省都要物色三几个人，以便广泛发展革命力量，待时机到来即相继发难，使清廷陷于四面楚歌，窘于应付。^[1]

显然，云南郑开文、罗佩金两人作为中华革命同志会、同盟会的军事骨干，均符合“首先是同盟会的会员或进步分子；其次是，每一省都要物色三几个人，以便广泛发展革命力量，待时机到来即相继发难，使清廷陷于四面楚歌，窘于应付”的选择条件，被邀约到广西编练新军的可能性以及利用与龙济光昆仲关系，兼而有之，都是他俩进入广西工作的有利条件。

广西，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对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革命党人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象征性意义。同时，广西、云南地处边远，靠近国界，方便与海内外联络，并

且，桂、滇政府、军队内部有大批同盟会会员潜伏，随时可以筹划临阵倒戈。在满清政府军队之外，广西民军也是中国同盟会历次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柳州方面有陆阿发、黄留芝等部，玉林方面有李立廷、封禄阶等部，南宁方面有王和顺、黄五肥、滕正宜等部，当时称他们为会党游勇。大量的民军还散布在广西各地，为反抗法国侵略者对广西边境的蚕食而缠斗，清廷无法把他们消灭。孙中山、黄兴很重视这些民军的力量，对民军的评价很高，希望也大，而保皇党分子则污蔑民军为“烂仔、土匪、革匪”等等。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指引，广西与云南接壤地区聚集了大量革命党人和民军武装，最有可能成为革命成功的策源地。1906~1910年间，孙中山、黄兴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组织多次起义，如：1907年4月钦廉防城起义，1907年9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0月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3月钦、廉、上思之战役。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以英勇果敢的流血牺牲，进一步宣传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激励着后继者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继续奋斗，坐实了当时的广西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舞台中最为光亮的焦点。

辛亥革命前大批革命党人进入广西，结果如何？若将先期到达广西参加广西新政建设的庄蕴宽、钮永健、蒋尊簋、蔡锷、吕公望等人也列入这个名单，就会发现辛亥革命前后数年，这个名单里竟然涌现出十多位民国初期中央官员、省长、都督级别的人物。如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的有：南京临时政府顾问李书城、陆军部参谋次长钮永健、陆军部军学局代理局长郑开文、第三军参谋长耿毅，还有陈之骥、程守箴、袁华选、石陶钧、王孝镇、杨源浚、冷御秋、刘建藩、耿毅、何遂、钱溥、林之渊、杨明远等人也都是名重一时的民国高级将领。列入都督级别的人物有：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江苏临时都督庄蕴宽，浙江都督蒋尊簋、吕公望（护国战争时期）。湖南省长赵衡惕、云南省民政长及护国战争期间任四川代理都督罗佩金。如果再加上摇摆不定、首鼠两端的巡抚张鸣岐（后任两广总督）、巡抚沈秉堃（广西辛亥独立时任广西都督）、藩台魏景桐（广西护理巡抚）、臬台王芝祥（广西独立时任副都督）、提督龙济光（后任广东都督）、广西左江总兵陆荣廷（广西独立后第二任都督，护国战争后期任两广都督）。这个清末民初广西官场的人员名单，绝对是个超级豪华阵营，诸多豪杰枭雄、将领、政客聚集在广西这个远离清政府统治的边远省份，成为当时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种社会矛盾，各种思想潮流的交汇、碰撞的前沿阵地，注定会在清末民初的新旧政权交替变幻的剧烈震荡中，演绎出波涛汹涌、惊涛骇浪的场面。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革命党人的地方也必然存在党外有党，党内有帮有派的政治氛围。

当时广西官场主要人物巡抚张鸣岐、藩台魏景桐、臬台王芝祥、提督龙济光、右江提督龙觐光、左江总兵陆荣廷等人均为汉人，在清朝权贵为主的清朝官场，能够攀爬到如此高位，自然是些老奸巨猾的人精，具备会做学问、会做事、会做人、会来事的超级本领，社会经验和阅历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典型人物如广西巡抚张鸣岐，曾当过师爷、幕僚，又很快爬升到广西巡抚、两广总督，还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和护国战争中的广东实权人物。其观人察色、顺风使舵、油滑虚伪和阴险毒辣的功夫堪称一流，算得上是人精中的人精了。王芝祥，兵备处总办、广西独立时的副都督、率部支援武昌起义的第三军军长，是个暴虐残忍的角色，当年就曾用革命党人、民军的鲜血染红了项上的红顶子。辛亥革命后摇身一变，竟然还成为国民党的大红人，其投机钻营的功夫绝对一流。提督龙济光，原本是个云南土司，带领团练几百人到广西抗法戍边，几年工夫就当上提督、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副都督、袁世凯时期的广东都督、一等公（公爵），其依仗手中掌控

的军队，在朝代更替的波诡云谲中，风大顺风，水大顺水，居然屹立不倒，左右逢源。在昏聩贪腐的满清政府官员中，这些汉族官员有革新政治、同情民族革命的一面。为了自身的前途利益，他们多少带点儿维新派的味道，或多或少表现出想改革旧体制、强兵富国的思维。另外一方面，他们是满清政府的鹰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权利、地位、财富都源于清朝皇帝的恩赐。在形势不明朗时，保住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持有敌意和严密防范。

以孔庚、尹昌衡、何遂为代表的年轻一族，革命热情高涨，比较激进。但历练太少，思想幼稚，被一些满清官员的维新、推行新政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以为广西地处偏僻，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用其在日本东京时的办法，公开半公开地在学生中宣传反清政府的言论，鼓吹民族革命，办《南风》报，《指南月刊》杂志，散发革命图书资料，公开拉人入会入党。甚至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宣传舆论造势越搞越凶，常常有几十个学生到街头演讲，宣传广州起义、鼓动行刺摄政王等，行动公开，说话激烈，引起官府的注意。

尹昌衡是这些激进党人的一个样板。其好饮酒赋诗谈论革命，他的诗句“有志须填海，无权欲陷天”，气大势雄，颇为当时年轻党人所传诵。尹昌衡与覃鎏鑫、吕公望、赵正平主办了广西最早的定期刊物《指南月刊》，出了若干期，因言论激烈被迫停刊。改为《南风报》后亦只出了一期，因为刊载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诗，尹昌衡还在杂志封面上画了一丛竹子，竹叶构成“民族主义”四个字，旁边又画了一只雄鸡引颈长鸣，题“雄鸡一声天下白”七个大字。比以前更加露骨、激烈地宣传反清复汉的主张，同仁多说其简直是用脑袋相拼。据目击者记载，那时，巡抚张鸣岐不时宴请这班新军人物，以示亲近笼络。其中一些激烈分子往往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谈其革命主义而毫无禁忌。某次宴会时，张鸣岐故意说“革命并不是一件奇怪和可怕的事情，本人立志刷新广西的政治和军事，即是革命，也就是广西革命的革命领袖”。尹昌衡等也无所顾忌地呼应道：“要想中国复兴，‘满清’是不能存在的。”王孝缜急忙用脚踢尹，示意不要乱讲话。

可是张鸣岐已经察觉了，笑道：“大家不用顾虑，畅所欲言好了”，还拿出几支新购的手枪来让大家传观。尹酒后兴起，接着手枪来连放数响，把天花板打了好几个洞。张鸣岐连称：“壮士，壮士！”，又对尹昌衡说：“广西地方太小，不足以容公。将来四川有事，可以多多借重（尹是四川人）”，尹大笑道：“世事难料，将来不知道谁借重谁呢”。张氏微笑不言，散席后还送每人一把安南刀，以示笼络之意。一班年轻人感情本易冲动，看到张鸣岐这样厚待他们，还以为他真能赞成他们革命呢，情绪就愈加激昂，行动愈加公开。

到广西参加编练新军的革命党人，因地域省份不同，国内与国外军校毕业学校的学历不同，立宪派与同盟会的身份不同，甚至由于年龄性格、处事方式的不同，经常会因分配职位的问题，彼此闹些意见，名位功利的得失有时也会形成激烈抗争。蔡锷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分在江西省编练新军，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一心想做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由于锋芒毕露，得罪了赣省的高官权贵，不久就被辞退。到广西后，痛定思痛，让年轻的蔡锷有了一番彻底的变化。看表面样子，蔡锷似乎没有什么革命者的味道，平时不好谈革命、进步，训话报告时常把忠君报国挂在嘴上。与其他革命党人也没有什么联络，就算是革命党人何遂拿着黄兴的亲笔信找他，也不愿意与刺毛满身的年轻党人发生纠葛。

由于报刊问题，尹昌衡、何遂的事情，张鸣岐对这班革命党人实际上很害怕，但忌憚王孝缜、尹昌衡等新军人物握有实权，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表面敷衍一番，暗地里阴谋布置，想把他们除去。急将前任陆军小学监督蒋伯器 and 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调入桂林。蒋、蔡一到，张鸣岐就变了脸，把陆军小学监督雷寿荣和兵备处经理科长孔庚扣押起来，并扬言要开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多亏各方人士的斡旋转圜，张鸣岐也怕事情闹大，牵连到自己知人不明的罪过，乃以少年浮躁为由，将尹昌衡、王孝缜和他约来的大部分同志撤职，离开广西了事。

还有一说，广西地偏民贫，向不为清廷所重视。作为同盟会的主要根据地，聚集了一大批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军人，他们创办《指南报》，筹备开设军事干部学堂及组建学兵营等活动，获得同志信任，同时也得到同盟会总部的赏识。就在革命党人活动有声有色时，军中同盟会预谋举事的计划为广西巡抚张鸣岐侦知，扬言要彻底调查，杀几个脑袋，震慑年青党人。党人内部互相怀疑，亦起纷争。为了缓和气氛，保护其他同志不受牵连，李书城、雷寿荣、尹昌衡、罗佩金等先后辞职，陈之骥、杨曾蔚、王孝缜等被限期离省。一时间风声鹤唳，同盟会在广西经营的革命基础，颠覆几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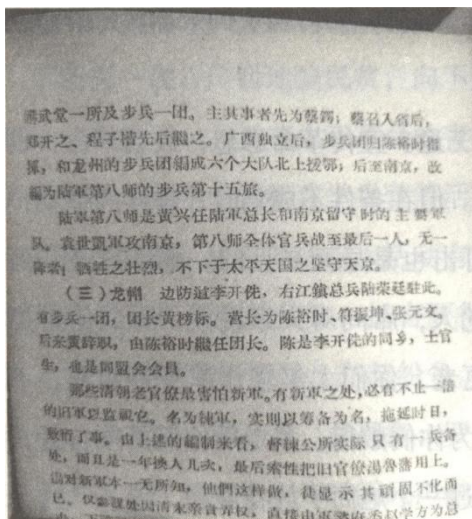
由此一瞥，广西官场这些人物的存在，决定了广西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一点也不比其他省份差，而革命党人却略显幼稚羸弱，缺乏斗争经验，人心涣散，不能形成合力。

一件小事说明了在桂党人的年轻冲动，其副作用甚至还改变了蔡锷的人生轨迹。事情缘由是广西因经费不足，新军由原定训练一师改为训练一个混成旅，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军官就过剩了。蔡锷决定用测验国文来甄别一下，成绩好的留下，差的淘汰。这个办法看似简单易行，实际上这些进入干部学堂的人谁没有自己的盘算，去留与否关系到今后人生事业的发展、收入的高低，大家都搞得很紧张。结果录取的百多人中，湖南籍的学生占大多数，广西本地人只取了三十多人。这件事引起广西学生的愤愤不平和剧烈对抗，其测验国文来甄别的后果形成激烈的反蔡冲击波，却是蔡锷所没有预料到的。平时对蔡锷有意见的年轻党人乘机扬言蔡锷袒护同乡，排挤本地人，并且通过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动员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罢课，学兵营罢操。这个反蔡运动很快波及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甚至广西谘议局也提出弹劾蔡锷议案，传递到清政府的最高层。王芝祥和护理巡抚魏景桐怕乱子闹大了，示意蔡锷离开广西，所以不久蔡锷就到云南去了。

革命者，舆论、帮会、军队厥为三途。宣传革命思想，鼓动革命，发展壮大同盟会组织的力量，无可厚非。但在条件不成熟时，这样的举动，给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也是显而易见的。蔡锷离开广西去云南前，宴请曾反对过他的年轻党人，席间对大家说：“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给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要拔苗助长。”说着在桌上取过一个炮筒子放在面前，说：“这个送你们作个纪念，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这一席话，可作为那些年轻革命党人所有活动的一个总结，也是蔡锷对革命同志的殷切希望。

1910年3月，蔡锷调往桂林干部学堂前，推荐郑开文接任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校长）和广西陆军模范团督办（团长）。著名革命党人何遂，当时也在广西参加编练新军，曾是同盟会广西支部总参议，其回忆录《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新军》是这样说的：

南宁系提督所在，所练新军属地方性的。有讲武堂一所及步兵一团。主其事者先为蔡锷，蔡召入省后，郑开之、程子楷先后继之。广西独立后，歩兵团归陈裕时指挥，和龙州的歩兵团编成六个大队北上援鄂。后至南京，改编为陆军第八师的歩兵第十五旅。陆军第八师是黄兴任陆军总长和南京留守时的主要军队。袁世凯军攻南京，第八师全体官兵战至最后一人，无一降者！牺牲之壮烈，不下于太平天国之坚守天京。^[2]



郑开文任南宁讲武堂总办的记载文章（何遂著《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新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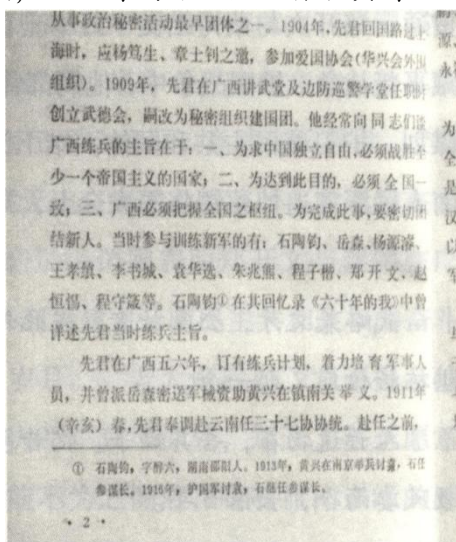
文中“郑开之”者，显然是个笔误或是铅印排版错误，结合蔡锷与郑开文的关系，以及郑开文在广西的革命活动来分析，接替蔡锷担任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和广西陆军模范团督办之人，确定就是郑开文无疑。这看似平常的调迁升职，其中包含的意涵，局外人很难窥探其中的奥秘。

蔡锷之子蔡端先生撰文说：“1909年9月，蔡锷在广西陆军小学堂及边防巡警学堂任总办时，吸收许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参与训练新军，其中有石陶钧、岳森、杨源浚、王孝缜、李书城、袁华选、朱兆熊、程子楷、郑开文、赵恒惕、程守箴等人。蔡锷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大的抱负，他成立一个叫‘武德会’的组织，嗣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他经常向同志们谈到广西练兵的主旨在于：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二、为达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3]

郑开文显然就是“武德会”和“建国团”的组织者、核心成员，与蔡锷一样，勤奋编练新军的目的是谋取广西军队的实权，此项任务在中国同盟会内仅有少数人知晓。他的直接联络人是黄兴，与广西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党人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秘密联系。郑开文为人做事，深沉肃穆，不苟言笑，亦不露声色，几近木讷持重的形象，表面上就是个踏实办事的军官，不过问政治，正是清朝官员、乡绅们所欣赏的“不狂、不躁、不贪”的品质。郑开文对同事、朋友向来都是忠义敦厚的，没有栖栖惶惶的急功近利，不为自己的官职大小计较，也不为钱银的多寡而分神，事功而不居，深得同事、朋友的器重，也被广西上层当权者所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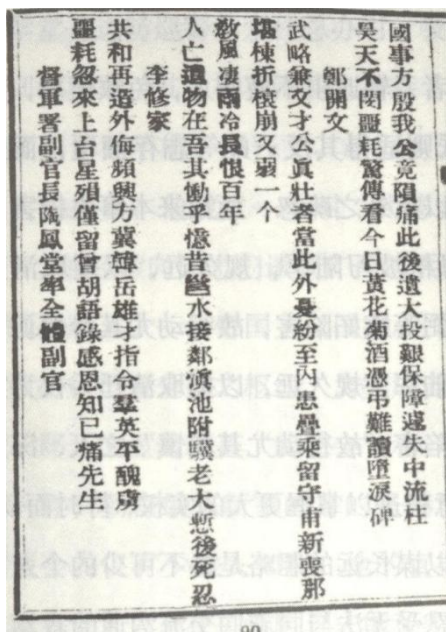
革命党文魁章士钊曾在《疏黄帝魂》一文中评价说：“当时的留学生谈革命者，显分为两派。一派出言无择，嬉笑怒骂，模仿柳敬亭一流人之说书，洎有为革命实事求是者，辄遮阻不使阑入，免致债事，刘禹生殆此派人之眉目也。……另一派则适得其反。此等志存颠覆，而迹求隐晦，平

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如杨笃生、蔡松坡皆其流亚也。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妬陷害，故行动尤其矜慎。”郑开文其实就是章士钊所言“……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妬陷害，故行动尤其矜慎”之人，深知自己承担的责任所在，韬晦蓄势、着意精进以掌握更大的实权，待时而动。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坚忍的性格、以谋长远的胆略是必不可少的个人素质，需要长期隐忍是非得失的诱惑，忍受无法与同志们交流沟通的寂寞，需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心灵煎熬，这只有胸怀远大目标和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对此受之如饴。



郑开文与蔡锷等人在广西编练新军的革命活动（蔡端著《蔡锷集》）

说到郑开文与蔡锷的关系，必须要交代几件事的因果关系，以求脉络贯通。郑开文与蔡锷结交于日本士官学校，在广西编练新军的岁月，在援藏平叛战争、护国战争中，他俩都曾并肩战斗，以勇气、智慧和血肉之躯，谋划、护卫着民主共和国体，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1916年11月，在云南人民深痛追悼蔡锷将军大会上，郑开文题赠悼念挽联写道：



郑开文悼蔡锷挽联（1916年11月）原载《蔡黄追悼录》



郑开文西征前夕蔡锷赠予的御寒长衫（党广源藏品）

武略兼文才，公真壮者。当此外扰纷至，内患迭乘，留守甫新丧，那堪栋折榱崩又弱一个。人亡遗物在，吾其恸乎。忆昔邕水接邻，滇池附驥，老大惭后死，忍教风凄雨冷，长恨百年。^[4]

挽联中的“留守”是指民国元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政权交接过渡中，黄兴被袁世凯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黄兴、蔡锷都曾是郑开文的直接领导、亲密战友、结拜弟兄，堪称“武略兼文才，公真壮者”，在新兴国家面临“外扰纷至，内患迭乘”之际，竟然先后辞世，“那堪栋折榱崩又弱一个”，表达了郑开文无比哀痛的心情。“人亡遗物在，吾其恸乎。忆昔邕水接邻，滇池附驥。”一语则表明郑开文与蔡锷在广西编练新军以积蓄革命力量；在昆明一起为建立云南民主共和政权的奋斗经历，以及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战斗岁月。“老大惭后死”之语揭示他们曾义结金兰，郑的年岁较大而忝为大哥。哀至深处，郑开文甚至愿意替他们先死，换回英雄的身躯，这不能不为之恻然，唯有血肉亲缘的感情才会有如此的哀号。而此时此刻“忍教风凄雨冷，长恨百年”的悲凉心情，更是让人痛恨绵绵。这幅挽联所展示如丧考妣的哀痛和惋惜的心情，是当时云南军政各界人士所稀见的，足见郑开文与蔡锷的深厚友谊。

顺便晒一下，挽联中“人亡遗物在，吾其恸乎”之遗物，是一件面料为藏青色缎子的长衫。特别之处，长衫的内衬是由百余只狐狸脚皮拼接而成，图案怪异，色彩鲜艳，衬托着华丽、典雅。我外婆曾说起这件长衫是郑开文出征西藏前蔡锷赠予的御寒之物，亦因经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护国战争”两役，蔡锷将军已是名满天下。所以，这件长衫就被我家珍藏了百年，母亲又交由我保管至今。

第二节 参加辛亥革命与率部攻克南京之战

1912年1月，在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的吕志伊、郑开文、张大义以及参议员段宇清、何畏等人，以云南士绅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大总统，为云南革命先烈杨振鸿呈请优恤，以彰忠烈。《上孙大总统请恤杨振鸿公呈》云：

云南在宁绅民吕志伊、郑开文、张大义、段宇清、谢树琼、何畏、张乃良、李伟、何汉、丁怀瑾、杨名遂、黄嘉梁、杨友棠等公呈：

为呈请优恤，以彰忠烈事。窃云南烈士杨振鸿，留学日本振武学校，自己已入同盟会。丙午毕业回国，鼓吹革命主义，不遗余力。滇英俊多受其感化，民气膨胀，以是时为极盛。滇吏嫉之，欲杀烈士者屡矣。嗣后用笼络政策，任烈士为腾越巡防军管带。烈士窃喜兵柄在握，可以为所欲为。抵腾后即布置，拟先占腾越、永昌，进据大理为根据地，再进取省城。……志伊等窃念今日共和成立，半系诸先烈不辞艰难困苦，断首糜躯，以激励人心之功。杨烈士于滇中革命，极力提倡，厥功甚伟。凡饥寒交迫，危难险阻，皆亲身备尝，而其气不稍馁，志不稍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坚。乃以大业未成，竟悲愤呕血而终，其志益苦，而其遇独难。属在后死，敢不尽表彰之责？用特连名呈请钧座，令下陆军部，查验恤赏章程，从优议恤，以慰忠烈而励来兹。^[5]

公呈详述杨振鸿烈士是云南同盟会的早期领导，领导发动滇西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病死于保山蒲缥的悲壮历程，让人们永铭他的功绩。

杨振鸿拯救国家危亡的革命热情、英雄气概是云南人为推翻满清政府而浴血奋战、不惜牺牲

的榜样，曾题诗曰：“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热血溅泥沙。头颅断送等闲事，一点泪痕一树花。”今天读来，仍然会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此呈大总统孙中山公文是当时在宁（南京）滇省士绅呈请政府优恤云南烈士杨振鸿的文件，署名者的身份很是特别：云南人吕志伊，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部长伍廷芳正参加南北议和的谈判，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务工作实际上是吕志伊全面负责，主持起草了一系列民国初期的法律文件，包括民国《临时约法》等法律经典。后世学者评论曰：“《临时约法》特别注意约束和限制最高权力，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都由选举产生，接受参议院弹劾，甚至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就废除了世袭制或指定制，消除了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存在的可能。这将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这就将各种权力都关进法律的牢笼，因而，《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充分地体现民主精神和权力制衡原则的根本大法，其制定、公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6]后来近代史上绵延多年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即根源于此，数千万民众、革命党人以头颅相拼，以血肉之躯捍卫的，其实就是这部《临时约法》所承载的法律尊严，可见其影响之深刻。

云南人郑开文，时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受陆军部长黄兴的委派，筹办民国第一个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并起草、制定了《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等军事教育文件，是为民国军事教育开拓之人。

云南人张大义，时任内务部总参事即内务部秘书长，在部长程德全未到任的情况下，内务部实际上是由次长居正、秘书长张大义主持工作。段宇清、谢树琮、何畏、张乃良、李伟、何汉、丁怀瑾等人时任议员，各建殊勋于世。可见，以中国同盟会主导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云南人在其中占有较高的位置，共和功成，贡献尤巨。

这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文件，让我们后辈诸人知晓郑开文时在南京，并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担任重要职务，显然与其中中国同盟会骨干成员的身份或其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劳绩有关系。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时间仅有数月，郑开文在陆军部工作时间也很短暂，故所存资料非常少，只能依据零星的材料予以分析。

辛亥革命时期，郑开文是如何到达南京的，至今是个谜。

笔者查阅到《嵩明县志 人物卷二十四 赵伸传》有言：“（赵伸）亟欲置身军界，乃由台抵桂，适有管带缺出，伸得补是缺。未逾年，武昌起义，各省派兵北伐。伸与郑开文、江映枢议率师到宁，由宁北上，而逊清退位，南北统一。”^[7]此文说明郑开文与赵伸等人是由广西率师攻克南京后率部参加北伐的。

依据史料，武昌起义前后，广西共派出五支队伍支持武汉、南京：（1）以黎天才率领的三营清军作为岑春煊的卫队在武昌起义前，因故滞留上海吴淞口。上海独立期间，由上海光复会首领李燮和策划反正，响应上海起义，协助革命党人攻克江南制造局，后参加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2）广西陆军混成协和广西学生军敢死队组成北伐军，由赵恒惕率领出发，支援武昌保卫战。1912年元旦后调往南京。（3）王芝祥因受陆荣廷排挤，乃请求带兵北伐，广西拨给他六个大队（一大队约一营）。该部在广西出发后，黎元洪即任命他为北伐第三军总司令。其部到达武汉时，南北和议已经告成”。^[8]（4）广西都督沈秉堃与湖南省部分军队组织了湘桂联军总司令部，沈任总司令，程

潜任参谋长，出发至中途，南北和议成功，该部没有到达南京。(5)广西另外一批北伐军是由陈裕时率领的邕标（驻南宁）和龙标（驻龙州，人数不足）。这批北伐军乘船到广州，再由海道到上海，与浙军朱瑞一同进攻南京，在天保城之战中打得很出色。^[9]

当然还有一个至今仍然没有头绪的线索。1920年3月，上海《民国日报》相关文章称：“盖郑开文为日本士官毕业生，与唐及顾品珍、赵又新同学，为生死之交。辛亥年为清廷兵站总监，弃南来”的报道。因此说，郑开文于1910年担任广西南宁陆军讲武堂校长和模范团团长后，由于政绩优异，或党人幕后的运作，被提拔为北方某兵站总监，由此南下参加某部攻克南京或以军备物资支持江浙联军，因身份特殊而隐居幕后，故不着其名，也不是没有可能。

分析起来，郑开文最有可能参加了以黎天才率领的三营军队在上海吴淞口炮台响应上海起义，协助革命党人攻克江南制造局，后参加江浙沪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1911年9月，因四川护路运动蓬勃发展，清政府委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川汉铁路督办，岑以黎天才为首的三营兵力为护卫，随其到四川上任。尤犹龙、郑开文、赵伸、赵钟奇、江映枢（黎、由、郑、赵、赵、江六人均均为云南人）在其中任参谋、营长等。载兵轮船行至武汉后，因岑春煊与军机大臣们意见相左，在上海称病不前，部队随之撤回上海吴淞口驻扎待命。期间恰逢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迅速蔓延，各省革命同志纷纷响应。上海光复会李燮和、柏文蔚到吴淞口与黎天才、尤犹龙、郑开文、赵伸、赵钟奇、江映枢等军官谋划反正，得到了广大官兵的一致响应，起义官兵迅速掉转枪口，加入革命阵营，参加了攻打江南机械制造局的战斗。起义官兵同仇敌忾，昼夜奋战，一举拿下江南机械制造局，为上海的光复立了大功。

上海在武昌起义25天后宣布光复。11月，为支援武昌保卫战，上海、江苏、浙江组成“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吴淞军政府以黎天才部的1000余人作为征战南京的主力，取名为光复军，也叫淞沪军、济军或辅字军（因为岑春煊是两广总督任上赴四川，其卫队又称粤军）。南京是长江下游重镇，扼守南北交通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当时以张人骏为两江总督和张勋为提督的南京守军，有两万人之多，张勋更是出了名的铁杆保皇派。他们依仗长江天险，凭借南京城墙宽厚，城四处建筑有多处炮台，顽固死守这个江南重镇。黎天才部从南京外围的龙潭、西河渡等处屯兵，于1911年11月24日攻克南京外围大门乌龙山炮台，夺得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首场胜利，意义重大，极大鼓舞了士气。黎天才部仅有1000多人，是战场上的威猛之师，骁勇善战。哪儿战况吃紧，炮台难啃，他们就挺身而出，谓“滇军不畏难也”。当时上海《申报》记者报道：“淞沪军（又称辅字军、济军）冲锋陷阵时，大多光着上身，赤足，奋勇前进。不顾饥寒疲劳，彻夜攻敌不止，个个都是拼命三郎。幕府山一战，获炮十四尊，降清兵500余人，江防参将张玉山以水师十三营来归，淞沪军名乃大振。”[《申报》影印件，1911年11月28日，（江苏省图书馆史料）]敲开幕府山炮台，然后调转炮口，居高临下炮击南京城，“精准的炮火，击中城中北极阁，时张人骏、铁良方观战其上，大惊，避入日本领事署中，因此逃逸”。淞沪军协助友军拿下天保城炮台，占领下关、狮子山、钟鼓楼、清凉山以及劝业场、督、藩两署等处。1911年12月2日，淞沪军首先由凤仪门开进南京城，全城光复。可以这样说，江浙联军攻下南京与围攻武昌的满清政府军事力量取得了某种平衡，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为随后的南北议和以及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筹建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

2016年6月，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意外发现民国元年1月16日，时任陆军、参谋部长黄兴的亲笔手令原件，意外揭开了郑开文在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工作的往事。此档案材料转载于《南京临时政府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94页：

陆军部关于陆军军官学校宣布式及发给委任状并点验学生令稿

(1912年1月16日)

部长命令：

陆军军官学校开办伊始，头绪纷繁，派代理军学局长郑开文于十六日午前九时，齐集官长学生到校行宣布式，发给委任状并点验学生交代，以昭慎重而专责成。须至命令者。

计开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生	金永炎派充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生	黄凯元着充本校副官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生	陈经着充第一队长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生	李浚着充第二队长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生	彭廷衡着充第三队长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毕业生	江煌着充第四队长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生	陈模着充骑兵科教官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辎重兵科毕业生	吴炳元着充辎重兵科教官
德意志陆军士官学校机关枪队毕业生	陈康时着充机关枪教官

陆军部长黄

陆军部次长蒋

元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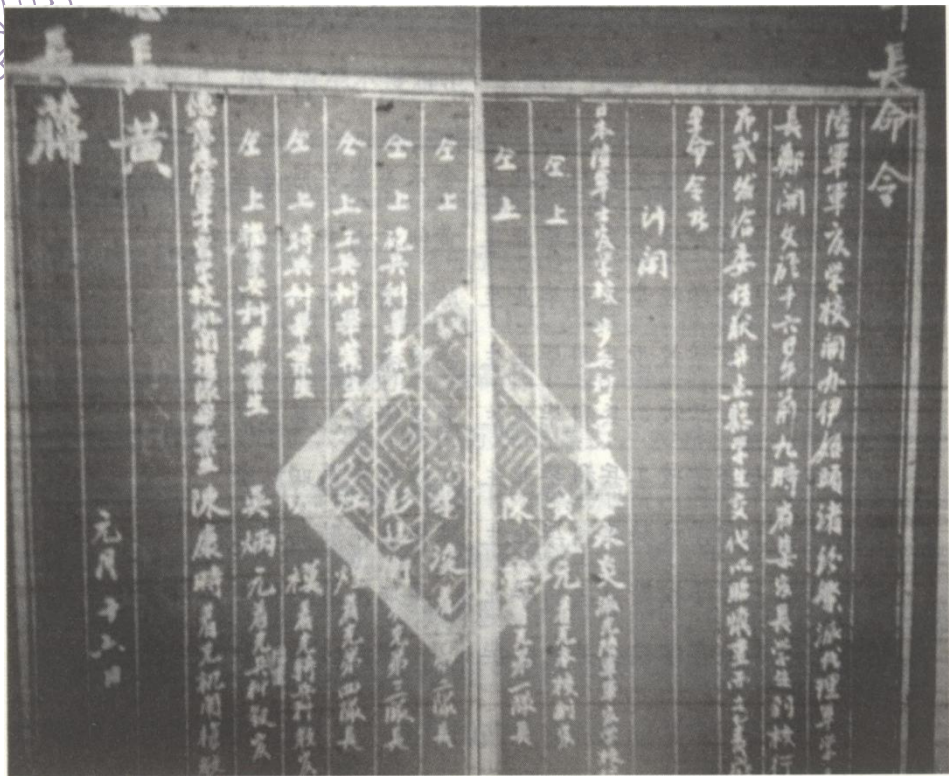
(按：原件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某兵科毕业，在金永炎之下采用缩略“同上”之语替代。笔者曾查阅到黄兴亲笔手令原件，签发者为陆军部长黄兴、陆军部次长蒋作宾。)

民国第一个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的管理人员均为当时的风云人物，是军官学校的一大特色。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金永炎曾任武昌起义时鄂军都督府参谋长，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高等顾问，与丁世峰、哈汉章、黎澍等参与策划黎元洪的所有政治活动，是黎元洪幕僚中的“四大金刚”之一。在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曾扮演重要角色，被皖系称为“黎幕四凶”之一。于1922年10月授将军府炎威将军，1923年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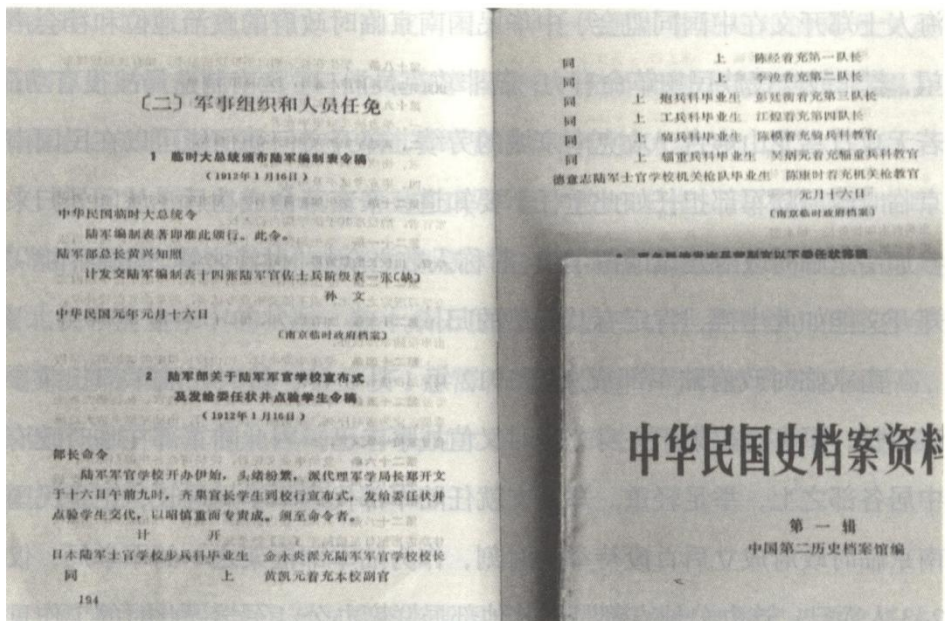
时任陆军部军官学校副官黄凯元先生也颇具传奇色彩，被后来史学者誉为革命元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黄凯元跟随黄兴至武汉，任战时总司令部顾问，后调任“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武官，南京临时政府直属第八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兼代旅长。二次革命中，1913年7月14日，黄凯元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率第八师坚守南京。失败后，随同黄兴潜乘“嵯峨号”军舰于7月30日抵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南京讨袁情况后，与王孝缜、陈裕时避难日本。1916年回国，唐继

只供阅读 侵权必究

尧、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黄凯元至长沙，劝说汤芑铭反袁，与有劳勋。



中华民国陆军部部长黄兴命令组建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的手稿原件（复印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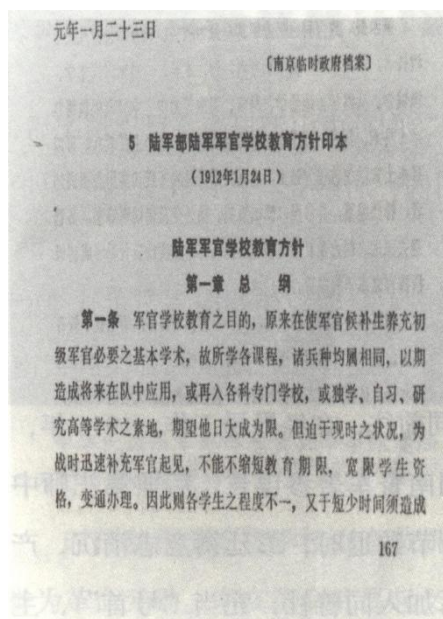


郑开文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期间，奉黄兴命令“宣布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的档案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94页

陆军军官学校第三队队长彭廷衡，清末时期曾任湖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是中国同盟会在湖南的主要领导人。1912年2月随从郑开文到云南工作。袁世凯召蔡锷赴京时，彭廷衡随同前往，在经界局工作。1916年，彭廷衡回湘投奔湖南督军谭延闿，任湖南督军署参谋长，后兼第三师中将师长。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彭廷衡意志消沉，产生遁世思想，便居长沙河西望城坡，后加入同善社，充当“号首”，主持湖南同善社活动，平日除研究儒、佛、道、教，从事

宗教活动外，还经常与各界道徒接触，策划各地社务。

从民国第一个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管理人员的位秩中，亦可见云南通海人士郑开文在中国同盟会、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若非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有力；若非攻克吴淞口、江南制造局战役有功；若无攻打乌龙山炮台、攻克南京城的劳绩，郑开文何德何能可以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担任如此重任。要知道，辛亥革命成功后，从国外归来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建设的留学生，时称人数之众如“过江之鲫，源源不断”，郑开文能如此出挑，肯定有其必然的归依。



郑开文主持编撰的《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影印件原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成立于1912年1月9日，黄兴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又值战事未已，因此陆军部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郑开文就任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正是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百废待举的时刻，作为陆军部框架之一的军学局，仅2-3人而已，连办公地点都是与其他部局联席办公。军学局此时的工作重点显然就在于筹建军官学校。从《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的发布时间（1912年1月15日）来看，是先有陆军部军学局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然后有“陆军军官学校宣布式及发给委任状并点验学生令”，即宣告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的正式成立。并且，军学局与军官学校的关系还在于，“以上各条，系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大纲。其余未尽事宜，俟本部斟酌现时情况，再行随时追加。至陆军军官学校内务细则，以及教育管理诸规则，由本部军学局与该校随时接洽，商酌办理，以期迅速施行。”由此可见，时任代理军学局局长的郑开文正是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第一个军事章程法令《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拟稿者，亦是民国第一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郑开文在南京临时政府筹建陆军军官学校的工作，具体还体现在军事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开拓和创新。鉴于当时满清政府还未完全推翻、南北议和前途未卜的状况，数十余万民军齐集南京，准备北伐。但是各省民军组织涣散，战斗力参差不齐，急需补充大批合格的军官予以整顿提高，从速恢复军事教育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正如《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所表述：

军官学校教育之目的，原来在使军官候补生养成初级军官必要之基本学术，但迫于现时之状况，为战时迅速补充军官起见，不能不缩短教育期限，宽限学生资格，变通办理。因此则各学生之程度不一，又于短少时间须造成其有军官资格，教育上即不免来种种之困难，全在各队长、教官体察各级学生之状态、程度，随时施以相当之教育，方能稍收效益。^[10]

从上述情形可以看到，急促筹建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做准备，不可能面面俱到，详细规划，只能“均视战时情况及各科学生所学程度以为决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事无前例，一切草创，军学局亦不例外。郑开文奉命筹建中华民国第一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俨然救火队员般责任重大，工作艰巨，刻不容缓。由于孙中山、黄兴的知人善任，郑开文以资深“中华革命同志会”“中国同盟会”骨干成员和曾任广西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和南宁新军模范团督办的工作履历、经验以及对民主革命事业的忠诚，保障了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的各项工作始终走在正确轨道上，其体现的军事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也堪称完美，适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求。

具体来说，《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和《陆军部陆军军官教育方针》采取了“对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存之”的方法，废除了“忠君”这一封建军事教育制度的核心内容，体现了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伟大成果；取消了尊孔这一旧教育制度的思想体系，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精神。如《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所述：

第一条 军官学校教育之目的，原来在使军官候补生养成初级军官必要之基本学术，故所学各课程，诸兵种均属相同，以期造成将来在队中应用，或再入各科专门学校，或独学、自习、研究高等学术之素地，期望他日大成为限。

第七条 教授之目的，在使各学生能明其意义，心中透彻，以养成其遇事有随机应变之能力也。故教官须顾虑各学生之素养与才能，用启发及注入之方法，善为训导，令其具有敢为之精神与确实之学识，以期其应用力之发达。

第八条 训育之目的，在就其各生已修之诸科更练达，其技能使之增进，以养成其能教导指挥小部队，有初级军官之能力也。但我国一般学生多半因不喜运动而体弱，以致缺乏活泼勇敢之气概。故教练一事，不独使战术能实地应用，并能发达学生之体育，以药其柔弱之病。故教练与技术须平等分配，于全学期间，步工兵至一营，其他兵科至一连，以施行各种教练，其间复兼以技术，又或摘讲操法教范，以明术科原则之要领，彼此互相补助，练成初级军官之技能为要。

第九条 军队主要之点战斗也。故军事教育亦以战斗为基准。而战斗动作之要领，在容许其适度之独断专行，以促攻击精神之发达，其他惟要求指挥之统一，动作之协同，以防其泛滥而全其成功也。故本校教授及训育，始终不外此要旨，以期养成活泼有为之军官。

第十条 凡军官之适否，不徒在其学识才能，尤重在其精神品性之如何。故教授学术之时，须常涵养其德性，鼓舞其精气，以发挥其成为忠爱民国之良质，陶冶其成为坚定军人之志操，最为紧要。^[11]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明确提出军事教育以培养“军人精神、德性”为主要的观点，培养军官“忠爱民国”的理念，而这种观点与理念一以贯之地体现在郑开文后来执掌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内务细则》中：“应以精神为主，精神

之消长即关于全军之强弱。以全身之精神振作军队，巩固国家，应以武勇信义，礼仪，军纪为主。至于服从上官，遵守命令、保持名誉尤为军人精神之基本”。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中，郑开文强调指出：“军人名誉关系重要，务加提倡，使知名誉重于生命，十分爱惜”。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陆军部陆军军官教育方针》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因袭传承的特征非常明显，届时实任职务，其撰稿人的身份确认是郑开文。



郑开文主持编撰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转载自《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档案汇编》）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郑开文任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制定了军事教育、军官培养方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为辛亥革命后军校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时，《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和《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成为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施政文件，充分体现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政权在军事教育领域里的教育主张，与当时社会进步潮流相适应，起到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作用。急促筹建“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不但是为即将来临的北伐战争培养合格的军官，以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顺应了基层军官、士兵对享受军事教育权利的期待。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党人重视了教育方面的改革和投入，迎合了人民大众对享受教育权利的期待。如，光复会领袖、革命党人蔡元培主持南、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期间，催使全国各地尽快开学，发布了全国教育大纲、组织新教学纲领、改革中小学学制等工作，让国人看到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和成果。郑开文在民国初期军事教育领域内的开创性工作，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成果的组成部分，其注重军事教育的革新和重塑，是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在军事教育领域内的重要应用，开创了民国军事教育之先河。

说一点题外话。相关文章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民国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显然不尽是历史事实。考证中华民国史料，民国元年1月16日开办的（南京）“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才是中华民国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时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郑开文奉命筹办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其军事教育、教学方针和教学体制、教学方法和规章制度，体现了民主共和思想理念以及革命党人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执政成果。但是，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连南京临时政府首创民国第一个陆军军官学校的署名权也概以否认，更遑论承继革命党人的

军事教育改革。史学家们评论袁世凯之恶，首在称帝。其实，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清朝大臣，从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第一天起，就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复辟旧制度，妄想建立袁家世代赓续的封建王朝。

在军事教育领域，袁世凯复辟旧制度的意味就十分明显。1912年7月，北洋政府陆军部将位于保定的陆军预备大学堂更名为陆军大学，迁往北京。在其旧址另行开办陆军军官学校，遂于1912年10月20日正式开学，即是名闻遐迩的“保定军校”之发轫。军校新设，但在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统治下，此保定军官学校无非就是袁世凯的第二个天津小站“练兵所”的模样，依然是训练“只知袁慰亭，不知其他”的私人军队，哪里还有一点民国新政的味道。倘若不信，请看1912年7月22日，北洋政府《政府公报》第一千一百五十一号载《陆军部呈军官学校暨第一预备学校宣誓日期文并批令》：

为陆军军官学校暨第一预备学校新到员生宣誓已毕，谨将举行日期汇呈钧鉴：事窃六月十五、十七两日，本部因陆军军官学校、第一预备学校新班学生及新添教员、官长入校，遵章举行宣誓，当经呈请训示应否派员监临军官学校宣誓。奉令派蒋雁行前往第一预备学校宣誓；奉令派王汝贤前往在案。兹据军官学校详称，校长遵飭稟商蒋将军，于六月二十五日十时，举行宣誓。于校中尚武堂后操场，设立神棚，供奉关岳武圣神像，作为举行地址，所有应行宣誓各员生统于是日由前因病假未及宣誓之炮科科长韩建铎率同，按照规定依次宣誓，一切礼节悉遵向章办理，校长亦随同在场监视。见各员生宣读誓词时，精神焕发，情意真挚，较第一次各员生宣誓时诚恳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保定军官学校宣誓仪式的报告，我们可以窥见袁世凯掌控下的军事教育，没有民主共和思想理念的丝毫情愫，有的只是忠袁保袁的说教和繁文缛节掩饰下的精神洗脑，与清王朝的军事学堂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读者有兴趣将此《陆军部呈军官学校暨第一预备学校宣誓日期文并批令》与郑开文主持编撰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和《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所体现的民主共和理念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袁世凯1915底上演“帝制自为”的复辟闹剧并非一时糊涂，不过是自始至终的一个封建官僚丑陋思想的充分体现和拙劣表演罢了，其与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不曾有过任何交集，如黑白两色，毫不搭界。

在此腐朽、封建味道十足的氛围下，保定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蒋方震（字百里）感受最深，甚至于要采取当着全校师生员工的面，拔枪自戕的决绝举动，以抗议袁世凯政府对军官学校教学改革的种种刁难和阻碍。

事情源于袁世凯北洋政府主导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虽然聘请日本士官学校和德国军事大学毕业的蒋方震为第二任校长，蒋方震也踌躇满志地为办好军校日夜操劳。曾说：“我此次奉命来长本校，一定要使之成为最完整之军校，使在学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良好之军队。我当献身这一任务，实践斯言！万一不效，当自戕以谢天下”。蒋方震勤恳任事数月后，次第施行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到各种检阅的改革方案，无论从形式或精神上观察，学校都有显著进步，因而更想对学校做一番彻底的改造。但是，北洋政府大量录用满清政府时期的旧军人、旧官员，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在军事教育领域展开了对革命党人在思想和组织上

的围剿清算，对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改革措施采取多方掣肘、故意刁难的种种卑鄙手段。面对北洋政府的克扣排挤，校事受阻，教官、学生次第离校，军官学校存亡于一线之际，蒋方震屡次亲自入京交涉，均无结果，实在让蒋方震校长忍无可忍，愤而在全校师生面前拔枪自杀，以死抗争袁世凯、段祺瑞扼杀具有民主共和精神的军事教育改革，更是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惊心动魄的“教育课”。《神州》杂志第一卷记载《军官学校校长自戕记》：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君方震留学日本，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即在该校充当教习。中国陆军学生在该国充当教习者，唯蒋一人。后又赴德国，在陆军大学肄业四年，立品端方，富有军事学识。自入该校以来，竭力经营，多方整顿，校中军纪风纪均增美善，学生功课亦极有进步。

忽于六月十八日之晨以手枪自杀。呜呼。人孰不贪生，而蒋君独自戕其生，岂无故哉。

该校原直隶陆军部军学司，该司司长育无知识，不解军事教育为何物，凡校用之器械书籍，蒋校长屡次请发，迄今数月尚不购备。而该司对于该校内务一切琐事，如一学生之请假；一器具之添置，莫不故意为难，多方掣肘。故校事无进行之望。蒋与平日谈话之间，辄谓愿为校务牺牲一己以尽其责，初犹不知其以身殉之也。自杀之前日，蒋校长赴京面谒陆军总长段祺瑞，陈述该校应办事宜，并有种种之请愿未遂所志，怏怏而返。

回保后，尤愤填胸，徘徊中夜，即有不能自克之势而自死之心决矣。十八日晨七点二十分，蒋君列集学生于庭，谆谆训诫，谓该校为民国军界前途一线生机，诸君须珍重军人道德，培养军人精神，增进军人学识，以尽军人天职。并云该校为民国最要之学校，若不能办好，皆本校长一人之罪，慷慨激昂，几至痛哭，言讫即转身背向，由衣袋内取出手枪，向左胁轰击，登时仆地，口中犹喃喃作愤语。副官等知变，即扶入寝室。入寝室后，副官即将军衣解脱，知子弹已贯入胸部，一时全校震惊，号哭之声惨不忍听。即时延西医珍视，伤势甚重，生死尚不可卜云。^[12]

所幸，蒋方震自戕时，是用“勃朗宁”手枪对正自己的胸部射击，恰有役工李某正站在他的身边，惊慌间挪他的右手一下，枪口稍偏，子弹由肺叶中间穿过，所以经过医生抢救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

蒋方震自戕前夜写了好几封“遗书”放在办公桌上。其中给保定军校教育长张某的信，内容是：“耀庭吾兄鉴之：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殉职。所有后事，处置如左：对于总长处，望即以告学之语告之，唯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对于军事，非有一至善之目的不能达到。勿以彼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也。……家母处，望告以仆之死为殉职，殉国，善为劝解为祷。家中薄田数亩，老母寡妻，尚能度日……”。致军校诸教官的信，则有“半年以来，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是也”之语。蒋方震的“遗书”在报纸上披露后，不仅在保定军校掀起了大风潮，而且震动了全国朝野。大多数学生悲愤万分，如丧考妣，各科都推举代表，组成校代表团。代表团除通电呼吁外，还上京请愿，直指陆军部魏、丁等任用私人，破坏军事教育。教官数十人亦联名向总统控告魏、丁等人滥用私人，把持军事教育的种种罪状。各省区都督或将领、名流，纷纷发电慰问，鄂督黎元洪派代表来看望蒋方震的伤势和慰问学生，直督冯国璋派他的军医处长来校为蒋方震治疗。云南都督蔡锷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

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申明：“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各界的函电，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了一道命令，说“该校校长蒋方震自戕，系陆军部军学司魏某、教育科科长丁某任用私人，把持教育所致。军事教育关系国家前途，何等重大，岂容部员任意把持。着派荫昌（总统府侍从武官长）、陈臣（参谋本部次长）前往查办”云云。此事本源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思图复辟旧制，滥用私人和旧官员所致，自然不了了之。

蒋方震就此不再回校任事，民国二年的军事教育改革遂戛然而止。继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是原（云南）清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八协旅长曲同丰，旧军人与想当皇帝的袁总统的勾连苟合，内外呼应，保定军官学校的结局可想而知。

题外话之外。郑开文与蒋方震后先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创办或管理了民国初期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为开创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的新局面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才智，可谓是民国初期军事教育界的两座巨擘，辉映时空。更为诡密的是，郑开文、蒋方震两位中央军官学校校长竟先后陨落在鲜为人知的宜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一个山峦叠秀、天蓝水绿的偏僻县城，令人扼腕唏嘘，惊叹莫名。

[1] 陈之骥著《二次革命前后回忆点滴》第1-2页。转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下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

[2] 何遂著《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新军》，载于《辛亥革命在广西》上册，第110-111页。

[3] 蔡端著《蔡锷集》，第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4] 《郑开文悼蔡锷挽联》，原载《蔡黄追悼录》影印件，云南国是报社辑，1916年11月。

[5] 李根源编撰《永昌府文征》（文录）第2714-271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6] 杨天石著《帝制的终结》，第354页。岳麓书社出版，2013年7月。

[7] 《赵伸传》，转载自方树梅辑纂《续滇南碑传集补校》，第2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

[8] 欧阳武著《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转载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卷第319页。

[9] 黄绍竑著《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转载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卷，第489页。

[10]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档案《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转载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67-1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11]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档案《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1912年1月15日。转载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59~16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 《军官学校校长自戕记》《神州》杂志第一卷第一册，第3-4页。转载自保定军校纪念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中国近代四大军事名校》第48页，保定军校纪念馆出版，2017年9月。